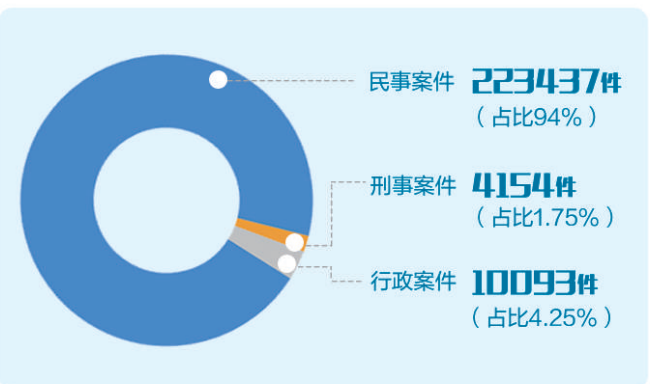
继北京上海广州成立知识产权法院又批复南京等15市设立审判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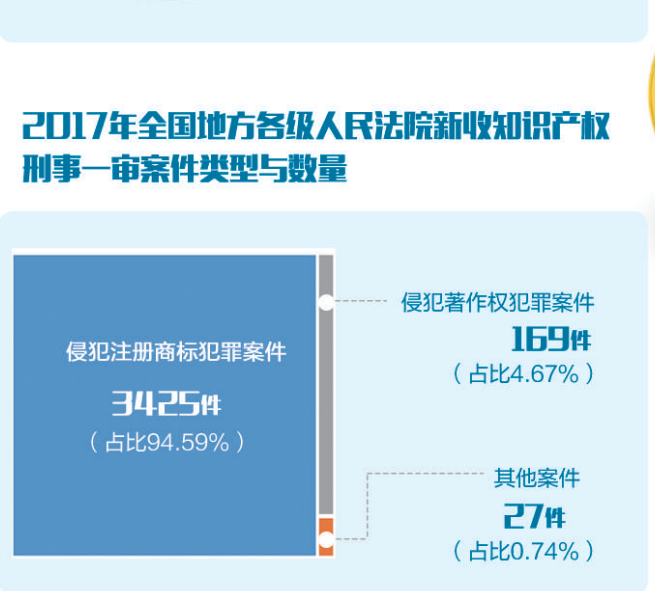
通过公正高效审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司法保护是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的“坚强护盾”。近年来，人民法院通过公正、高效、权威的审判，向社会释放和激发创造活力，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的法治环境，大力提升我国的核心竞争力。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显著增强





在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大幅增加，新类型、重大疑难案件日趋增多，案件审理难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以民事审判为基础，行政审判和刑事审判并行发展，公正高效地审理了大量知识产权案件。

知识产权纠纷不断涌现，涉外案件逐年上升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的《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7年）》（白皮书）披露，2017年，人民法院共新收一审、二审、申请再审等各类知识产权案件237242件，审结225678件（含旧存），比2016年分别上升33.50%和31.43%。

白皮书显示，在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中，著作权、商标和专利案件分别为137267件、37946件、16010件，分别同比上升57.80%、39.58%、29.56%。其中，著作权案件占2017年全国地方各级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总数的68.28%。迅猛增长的著作权案件说明，著作权越来越受到市场主体重视，并成为市场竞争中角逐的新增长点。

“从案件分布看，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5省市法院收案数量占全国法院案件总数的70.65%。”最高法院民三庭庭长宋晓明说，2017年全国法院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呈现迅猛攀升态势。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人们对时尚的追求和对于文化娱乐生活的重视，涉及尖端、前沿疑难复杂技术的专利案件、涉及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品牌保护的商标纠纷案件、涉及信息网络传播的著作权纠纷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竞争纠纷不断增多，与娱乐产业有关的新类型知识产权纠纷也不断涌现，审理难度不断增大。

“从各地法院报送的案例来看，在新型产业发展中，因抄袭他人网络游戏、网络商业模式运用、体育赛事直播等行为引发的著作权纠纷或者不正当竞争纠纷越来越多，暴露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宋晓明说。

据介绍，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逐年上升，呈现出案件类型新、审理难度大、社会关注度高等特点。从全国法院来看，目前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占比在20%左右。

宋晓明表示，从法治环境上说，这些年来，人民法院在处理涉外案件中对当事人都是一视同仁。国外相关机构统计，中国处理涉外案件的审判周期应该说在世界上是最短的国家之一。如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的涉外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是4个月，欧盟主要国家的审判周期在18个月左右，美国仅就专利案件的前期准备就要29个月。中国法院由于司法程序快捷，现在也被视为知识产权诉讼较为可取的诉讼地。

全面加强保护力度，提升侵权违法成本

“最高法院强调以市场价值为导向，着力解决‘赔偿低’问题，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提升侵权人的违法成本。同时，依法提高司法救济效率，完善知识产权的行为保全、证据保全、财产保全措施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说。

近年来，人民法院通过积极合理运用知识产权行为保全措施、科学计算损害赔偿数额、类推适用相关法律条款等法律手段，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的及时性、便利性和有效性。

最高法院近日发布了2017年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其中，“茅盾手稿”著作权纠纷案涉及美术作品拍卖活动中著作权法、物权法、拍卖法三部法律交叉调整地带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该案判决明确了不同主体权利的边界，体现了对物权人和著作权人合法权益平衡保护的司法精神，并按照尽职拍卖人的合理标准对拍卖公司要求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充分体现了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司法导向。

对于拉菲罗斯柴尔德酒庄诉上海保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法院判决两公司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共同赔偿拉菲酒庄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200万元。该案类推适用商标法关于恶意使用未准予注册商标应当赔偿的规定，对恶意使用未注册驰名商标的行为人判令承担赔偿责任。

宋晓明说，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确定方式有4种，最后一项是法定赔偿。我国商标法法定赔偿线上限是300万元，专利法最高赔偿上限是100万元。北京法院在一起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件中，对当事人提供伪证行为处以上限100万元的罚款。最高法院在过去提审案件当中，也曾经处罚过100万元，目前正在执行局执行过程中。

北京高院4月20日正式发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指南》在损害赔偿的适用方法和计算依据上进一步细化，特别提出了裁量性赔偿方法确定的数额可以高于法定赔偿的最高限额、赔偿合理费用不计入法定赔偿限额内。

“北京法院坚持知识产权案件损害赔偿与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创新贡献度相匹配的理念，深化司法裁判对于知识产权定价的引领作用，使侵权者付出应有代价。”北京高院民三庭庭长杨柏勇说，在损害赔偿的确定上，侵权损害赔偿只有充分反映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才能实现对创新者的充分救济，让创新者坚定创新信心、提升创新活力。

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系，裁判尺度更统一

目前，北京法院已初步建立全市三级法院技术调查官资源“共享”机制。技术调查官这一法庭上的新角色在技术类案件事实查明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健全完善技术事实查明机制，是人民法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改革创新的一个亮点内容。陶凯元介绍，2017年最高法院完成《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选任工作指导意见（试行）》起草工作，不断丰富和完善技术事实查明各项制度。

北京、上海、广州三家知识产权法院自成立以来，创造性地开展了很多司法实践。据了解，三家知识产权法院的成立和运行在取得成功经验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实际困难。例如，知识产权二审案件的审理法院不统一，容易导致裁判标准不统一。同时，知识产权授权确权二审案件和知识产权民事侵权二审案件分别由不同法院审理，影响审判效率。目前，最高法院正在进一步听取有关部门的意见，按照法定程序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为从根本上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性难题，最高法将加快研究建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宋晓明告诉记者，经历1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知识产权大国，科技创新对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司法需求不断增强。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运行实践为设立国家知识产权法院奠定了扎实的实证基础。

据介绍，最高法院已批复在南京、苏州、武汉、西安等15个市设立跨区域管辖的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以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机制，提高审判专业化水平。

“人民法院通过具体案件的裁判明确行为规则，为社会公众提供指引，同时借助各方力量，促使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各尽其能、形成合力，有效化解知识产权纠纷。”宋晓明说。

审计一线

空壳骗贷难逃内审『金睛』

本报记者　姚进

无注册地、无经营及存货的空壳公司，凭借虚假财务审计报告、购销合同及增值税发票骗取银行贷款，用于F置业有限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发。这一借款人骗贷案被某银行内部审计部门对下属分行开展的例行风险审计过程中发现。

事情缘起于异常现象。一方面，作为借款人的A工贸有限公司，其信贷档案中缺少能够证明经营情况的材料；另一方面，A公司资产和所有者权益超常增长。据其提供的经审计财务报告显示：公司成立当年及第二年资产为1248万元、2967万元，负债为520万元、707万元，所有者权益为728万元、2259万元，但到第三年末资产猛增到16176万元、所有者权益猛增至15670万元，负债则减少到506万元。

这些通过非现场分析发现的异常情况引起了审计人员的关注，由此把审计目标锁定在核实A公司经营业务的真实性上。

首先，审计人员在仔细阅读A公司各年度审计报告原件后，注意到某年审计报告正文右上角有一行字，为“验证码d420****　****69c2”，这是某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提供的该省注册会计师网站鉴证报告查询编码。每一个经报备登记的审计财务报告都会自动形成一个编码，在该网站上输入正确的编码，就能验证该审计报告上主要的财务数据。结果发现网络查询数据与审计报告原件数据相差巨大。

为确保情况属实，审计人员以经营行的名义写了一封书函，将审计报告上有异议的数据列出，请求会计师事务所帮助确认审计报告上的数据。经核实，该省注册会计师网站上提供的数据是真实的，但由A公司提供的审计报告上的数据不正确，是A公司编造了审计报告。

其次，现场审计发现，A公司现场提供的贸易合同原件与申请贷款时送交的合同复印件内容一致，但格式、印章不一致，二者不是同一份合同。

具体表现在：两份合同的字体和行距不一致，两份合同上的交易对手C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印章大小不同。经咨询，审计人员登门拜访C公司驻地办事处，请该公司人员确认合同真伪。尽管C公司以审计人员并非当事人为由，没有提供合同原件，但告知审计人员，合同金额和日期均不一致、合同交易对手亦非A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审计人员索要了C公司的印章样本。经分析和对比所获得的信息资料确定，A公司所提供的申请贷款的销售合同复印件中C公司印章为真印章，但是合同的供货方不是A公司，合同日期、金额也不一致；审计现场提供的销售合同原件所加盖的C公司的印章为假印章，是为配合审计人员调阅合同原件要求，A公司私自雕刻的，因此该合同原件为造假。

为进一步核实交易真实性，审计人员又从增值税发票入手。该贷款用于向D商贸有限公司购买建材，并将信贷资金900万元转到供货方D公司账户，借款人A公司提供供货方D公司于某年9月8日至10月19日开出3207万元的13张增值税发票复印件。

经仔细辨认，发现发票的购货单位一栏里有微小的方框，审计人员意识到这些发票可能是假发票，是将购货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和电话等内容打印出来做成小纸条，贴在发票的复印件上再复印形成的。审计人员调阅上述发票原件，借款人A公司均不能提供。

经登录国税官网和拨打电话12366核实，借款人A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复印件属虚假发票，发票的购货方并非此借款人，发票金额为编造。

再次，审计人员在走访A公司的经营场所中发现，该地址是一间居住民房。于是，审计人员又要求客户经理带领走访借款人，发现A公司所在的办公场所为某房地产公司办公楼5层中的一间办公室。审计现场要求提供相应购销合同原件和查看存货，A公司均未能配合实现。

最后，在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发现另有一户借款人B商贸有限公司，申请贷款的交易对手同样涉及上述案例中的C公司和D公司。于是，审计人员将该户贷款纳入视线，依据上述审计方法仔细审查，发现该公司也是F公司的另一个融资平台，与A公司一样，存在以虚假财务报告骗取银行信用、以虚假购销合同和增值税发票骗取银行贷款的问题。由此锁定“F置业有限公司借助A、B两个空壳贸易公司骗贷搞房地产开发”的犯罪事实。

针对此案，业内人士向审计人员建议，一是认真审核相关信贷资料，并对其所涉及的关键数字和证明材料调查核实，从中找出线索和端倪。二是采取“内查外调”的全方位审计方式，特别是在银行信贷档案中都是留存资料的复印件的情况下，更应注重以外部证据来验证资料的真实性，通过比较分析，调查借款人经营情况。三是做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细节。对涉及同一事物、同一交易对手、同一现象的要高度关注，敏锐地将相关事物高度关联，举一反三，在审计过程中小心求证，挖掘线索，还原事物本来面目。

国内首例云服务器提供商被诉侵害知识产权案二审开庭

存储盗版游戏《我叫MT online》，阿里云如何担责引争议

于中谷

庭审现场

现代人是生活在“云端”的一代人。我们所享受的很多网络服务是由开发者们将写好的程序上传到“云”里运行，或是使用“云”里提供的服务。云平台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便捷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如果有人将侵权作品上传到云平台运行获利，云平台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吗？什么是“通知+删除+转通知”规则？

4月18日，《我叫MT　online》游戏作品侵权案二审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庭审理。据悉，该案是国内首例云平台服务器提供商被诉侵权案。上诉人（原审被告）阿里云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北京知产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乐动卓越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北京知产法院受理该案后，公开审理了此案。

乐动卓越公司认为，自己从权利人处获得了对动画《我叫MT》改编成游戏的独占许可权，并自主研发了手机游戏软件《我叫MT　online》。乐动卓越公司得知callmt.com网站提供《我叫MT畅爽版》游戏，该游戏系侵权人非法复制《我叫MT　online》游戏的数据包，通过callmt.com网站非法运营获利。

乐动卓越公司调查发现，《我叫MT畅爽版》游戏内容存储于阿里云服务器，并通过该服务器向客户端提供游戏服务。乐动卓越公司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阿里云公司断开链接并停止为《我叫MT畅爽版》游戏继续提供服务器租赁服务，并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及合理支出11240元。

一审法院认定，阿里云公司侵害了乐动卓越公司对涉案游戏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判决阿里云公司赔偿乐动卓越公司经济损失25万元及诉讼合理支出11240元。

在北京知产法院开庭庭审过程中，上诉人阿里云公司认为，云主机服务属于底层技术服务，不应当机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不宜设定严苛的注意义务。阿里云公司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无不作为情形。一审判决认定阿里云公司侵权，一方面会导致阿里云公司及相关同行业经营者在接到通知后立即关停服务器，可能影响网络运行安全，另一方面会导致权利人放弃对直接侵权人的维权转而起诉技术服务提供商，最终阻碍服务器租赁等基础技术服务行业的发展。

阿里云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将《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随意扩大解释为所有网络服务提供者，关停服务器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的“必要措施”，要求阿里云公司履行的“通知+删除+转通知”的义务，没有法律依据。并且，一审法院侵权对比软件有误差，酌定赔偿金过高。

由此，阿里云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判决结果违反了利益平衡原则，其判决的赔偿金额没有事实依据。故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乐动卓越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乐动卓越公司二审答辩认为，阿里云公司在应知其服务器租赁用户利用其网络侵害乐动卓越公司游戏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情况下，不积极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应认定其构成帮助侵权，并就扩大部分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当天的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充分发表意见，围绕以下焦点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被上诉人主张的侵权软件是否包括涉案游戏的服务器端部分，被上诉人主张的侵权软件手机端下载来源，上诉人被诉服务的性质，被诉行为能否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及《侵权责任法》，被上诉人的两次通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上诉人接到通知后是否应当采取关闭服务器、通知服务对象或询问通知人的措施，上诉人是否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以及赔偿数额。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梁剑箫